



西夏佛教概況

提起西夏佛教，人們較為陌生，鮮為人知。因為西夏佛教史長期以來被排除於「正史」之外，無一席之地，倍受冷落。然而，西夏佛教作為中國佛教的一個組成部分，對西夏的文化、歷史發展產生了一定影響，在中國佛教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西夏文大藏經，是整個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中的一份珍貴遺產。

位於我國西北的西夏王朝，於一〇三八年黨項族建立的政權，國號「大夏」，史稱「西夏」，在今寧夏、陝西北部、甘肅西部、青海東北部和內蒙古西部地區，於公元一二二七年為元朝所滅，歷時約二百年，經歷十位皇帝之相繼。

西夏是一個多民族的王朝，有黨項族、漢族、藏族、回鶻族等。其中黨項族是西夏的主體民族，該民族是一個古老的民族，有着悠久的歷史，在中古歷史發展中起過突出作用，為締造偉大的中華民族作出了卓越貢獻。

①《舊唐文獻通考》卷五十四

②《日不舊開卷》卷五十四

③《帝京景勝圖》卷四

④《蘇然居士文集》卷三《觀萬對寺人琴韻詩一首》

⑤《五燈集》卷十四

⑥《蘇然居士文集》卷十三《萬對寺人萬壽詩一首》

⑦《蘇然居士文集》卷一

⑧《元野史》卷八

⑨《元史》卷一百一十二

⑩《碑曰》：「五南院會代萬壽寺西」

⑪《碑曰》：「五南院會代萬壽寺西」

⑫《碑曰》：「五南院會代萬壽寺西」

道元

在南北朝和隋朝之際，黨項族已經有許多部落。每一部落為一姓，其中以拓拔部最為強大。唐初，黨項各部落先後歸服唐朝，拓拔部首領拓拔赤辭受封為西戎州都督，并被賜以李姓。唐末，因爆發了震動全國的黃巢大起義。黨項族首領拓拔思恭起兵幫助唐朝鎮壓起義軍，後拓拔思恭也被唐朝賜以李姓。從此，黨項族拓拔氏便躋身於北方諸藩鎮之中。五代時，黨項政權先後依附於中原的梁、唐、晉、漢、周各王朝，其勢力日益發展壯大。

趙宋王朝取代後周後，黨項政權又歸屬宋朝，其首領拓拔氏又被賜以趙姓。宋寶元元年（一〇三八年），元昊建立大夏國，黃衣稱朕，改元天授禮法延祚，是為景宗。從此開創了西夏一百九十年的基業。西夏歷代帝王都篤信佛教。

作為西夏的開國皇帝，景宗元昊不僅在政治上、軍事上有突出的作為，在佛教的傳播上也作出了特殊的貢獻。在《隆平集》

卷二十載元昊本人「曉浮圖（佛陀）法」，又「通漢文字」。因此，他對佛教和漢文化有較深刻的了解，對西夏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卓絕的貢獻。在建國前兩年（一〇三六年）他就高瞻遠矚，讓大臣野利仁榮等創造了記錄黨項族語言的民族文字——蕃文，也就是後世所謂的西夏文。這種文字借鑒漢字的某些造字方法，又有自己的特點。元昊大力推行蕃文，尊為「國字」，使「藝文誥牒盡易蕃書」（見《西夏書事》卷十二）。他在融匯中原漢族文化和突出民族文化的過程中，加速了對中原佛教的吸收和對本民族佛教的傳播，極力地創造條件使佛教適應在西夏地區的流佈和發展。

元昊除創製西夏文字外的另一突出貢獻，便是用西夏文翻譯佛經。早在宋景祐元年十二月（一〇三五年）元昊就向宋朝求賜佛經，准備漢文佛經譯經的底本。其時，西夏文字并未創立，就做好了翻譯漢文佛經的准備工作，可知元昊是多麼推崇佛教。他用本民族文字西夏文翻譯佛經，這是個浩大的工程，後在歷代王室的大力支持下，整整花了約半個世紀的時間，把漢文大藏經譯成了多達三千六百多卷的西夏文大藏經，使包括皇族在內的黨項族有可能直接接受佛教的理論和知識，為佛教在西夏境內的順利發展和廣泛傳播創造了先決條件。從而使佛教成為西夏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可以說，用西夏文翻譯佛經，這是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創舉，在西夏佛教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西夏佛教史上最重要的一頁。

在西夏文佛經的翻譯、刻印、流傳的同時，還刻印了漢文大藏經和藏文大藏經，大量施放，使之廣為流通。這幾種文字的佛經同時流傳於西夏，推動了佛教在西夏的迅速發展，使西夏的佛教出現了繁榮的景象。

元昊爲了建國興邦，便大力提倡佛教，以佛法治國，淨化民衆。在佛教的發展方面，他不拘一格，對佛教有頗多建樹。他在位期間，建寺造塔，廣度僧尼。他在立國之初，大興土木，興建了第一個大型的佛教舍利塔，悉心修飾，規模宏偉，所謂「下通掘地之泉，上構連雲之塔」（見《嘉靖寧夏新志·大夏國葬舍利碣》），就可想而知，塔之巍巍，塔之壯觀。致使「東土名流，西天達士」前來供奉舍利。元昊造塔的目的是：「所愿者，保祐邦家，并南山之堅固；維持胤嗣，同春葛之延長。百僚齊奉主之誠，萬姓等安家之息。邊塞之干戈偃息，倉箱之菽麥豐盈。」（見《大夏國葬舍利碣》）元昊建塔是西夏佛教最早的記載。

元昊十分重視建設大規模的寺廟。天授禮法延祚十年（公元一〇四七年），他興建了規模宏大的佛教寺廟高臺寺，用以貯存宋朝賜給的漢文大藏經，并請回鶻僧人在此演經、譯經。古代的回鶻族已較早地信仰了佛教，他們曾把大批佛經譯成回鶻文，在理解佛經方面往往能明其旨要，在翻譯佛經方面有較豐富的經驗。元昊延請回鶻僧人，給他們以較高的禮遇和地位，請他們把佛經翻譯成西夏文。是故，回鶻僧人對西夏的譯經事業起了大大的促進作用。這在漢文文獻當中也有記載，如《西夏書事》卷十八：「於興慶府東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臺寺及諸浮圖，俱高數十丈，貯中國所賜大藏經，廣延回鶻僧居之，演繹經文，易爲蕃字（即西夏文）。」

據《嘉靖寧夏新志》記載，元昊還在興慶府爲亡兄之妻沒藏氏建戒壇寺，戒壇寺也是一座大型寺院。又據《喜靖寧夏新志》記載，元昊還在西路廣武營造大佛寺。可見元昊時期建寺不止一次。正因爲元昊建寺造塔，開西夏佛教寺塔之先河，所以後世帝王在元昊影響下，也紛紛廣建寺塔，廣度僧衆，使西夏境內塔寺

林立，以致後世詩人發出「雲鎖空山夏寺多」之感慨。

元昊時期還規定每年的四孟朔，即各季第一個月的初一為聖節，下令官民悉皆禮佛，全民歸依佛教。通過這樣的全民性的佛事活動，推動了佛教在西夏的發展。

不難看出，元昊時期通過欽崇佛道、求贖佛經、翻譯佛經、建寺造塔等活動，為西夏佛教的發展鋪墊了穩固的基石。

元昊做了十一年的皇帝，於天授禮法延祚十一年（公元一〇四八年），在宮廷內亂中被自己的兒子寧令哥刺傷而死。他的另一個兒子諒祚在襁褓中即位，是為毅宗。他的生母是沒藏太后，即前述出家為尼住於戒壇寺的沒藏大師，便執持朝政。沒藏大師十分好佛，她上承元昊崇佛的餘緒，繼續推動西夏佛教的發展。

沒藏氏在垂簾聽政的第三年，即天祐垂聖元年（公元一〇五〇年）冬，開始興建承天寺，「役兵民數萬」，修蓋精舍，建立高塔，厚葬舍利。修建宏偉的承天寺，其旨是：「今上皇帝，幼登宸極，風秉帝圖。分四葉之重光，契三靈而眷祐。奧以潛龍震位，受命冊封。當紹聖之慶基，乃繼天之勝地。大崇精舍，中立浮圖。保聖壽以無疆，俾宗祧而延永。……金棺銀罇瘞其下，佛頂舍利闕其中。」（見《嘉靖寧夏新志》卷三）承天寺建成後，貯存中國所賜大藏經，并延請回鶻僧人登座演經，沒藏氏與幼主諒祚時常臨聽。毅宗諒祚十六歲親政後，又向宋朝求賜大藏經，進一步加強了夏、宋之間的佛事往來。不僅如此，他還與遼朝進行佛教的交流，向遼朝貢回鶻僧、金佛、《梵覺經》。可見回鶻僧不但為西夏演經，而且還是聯繫兩國間佛事友好往來的紐帶。另據《嘉靖寧夏新志》記載，諒祚在位時還在鳴沙州（今寧夏回族自治區中寧縣）城內建安慶寺。

毅宗諒祚於拱化五年（公元一〇六七年）死，其子秉常也是

孩提繼位，是為惠宗。因惠宗年幼，母親梁太后攝政。時值北宋王安石變法。大安二年（公元一〇七五年）秉常年十六歲始親政，仍推行佛教的政策。為了發展佛教，也曾向宋朝求賜一部大藏經。

在惠宗秉常執政時期，加強了西夏文佛經的翻譯，目前保留下來的一部分西夏文佛經，卷首就明確記載為惠宗和其母梁氏所譯。特別是北京圖書館所藏的一幅西夏譯經圖，圖中描繪了皇太后梁氏和惠宗秉常分坐於譯場兩側，參與譯經的場面。作為西夏的皇太后、皇帝能親臨譯場，這反映了當時西夏王朝對譯經事業的高度重視，對西夏譯經是一種很大的推動。自從開國皇帝元昊開創了西夏文譯經局面後，西夏譯經事業從無到有，迅速走上了蓬勃發展的道路。至惠宗時，西夏的譯經事業達到了高潮。

在現存的西夏文佛經中，卷首載有譯經者題名者，以惠宗秉常為最多，在卷首題款上皆標有「御譯」的式樣。在北京圖書館所藏西夏文《金光明最勝王經》卷首的一篇流傳序中，記錄了秉常時期的譯經情況：「後始奉白高大夏國盛明皇帝（指惠宗秉常）、母梁氏皇太后敕，渡解三藏安全國師（是謂稱號）沙門白智光，譯漢為蕃。文華明，天上星月閃閃；義妙澄，海中寶光耀。」其中所說國師白智光，是惠宗時期一位著名的譯經大師，是西夏佛教譯經事業中兩位傑出的代表之一。另一位是元昊時期的譯經大師，名曰白法信，也是國師。這在西夏文《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的發願文當中有記載：「戊寅年中，國師白法信及後稟德歲臣智光等，先後三十二人為頭，令依蕃譯」。這兩位譯經大師，在西夏譯經史上佔有最重要的地位。所以在惠宗秉常時期，為西夏譯經的重要時期。

秉常時期還刻印了很多漢文佛經，在黑水城遺址出土的西夏

漢文佛經中就有一部分是這一時期刻印的。其中有天賜禮盛國慶五年（公元一〇七三年）印施的《般若多心經》，該經為私人刻印。這是目前所知最早西夏本的漢文佛經。大安十年（公元一〇八二年）西夏大延壽寺演妙大德沙門守瓊印施了漢文《大方廣佛華嚴經》。

天安禮定元年（公元一〇八五年），秉常死，其子乾順三歲即位，是為崇宗。因崇宗年幼，母后梁氏專權。母后梁氏是佛門虔誠的施主，十分敬教崇佛。乾順天祐民安四年（公元一〇九三年），由皇帝、皇太后發愿重修涼州感通塔及寺廟，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使重修的感通塔雄偉莊嚴，富麗堂皇：「妙塔七節七等覺，嚴陵四面四河治。木干覆瓦如飛鳥，金頭玉柱安穩穩。七珍莊嚴如晃耀，諸色莊飾殊調和。繞覺金光亮閃閃，壁畫菩薩活生生。一院殿堂呈青霧，七級寶塔惜鐵人。細線垂幡花簇簇，白銀香爐明晃晃。法物種種具放置，供應一一全已足。」（見感通塔碑文）此塔於第二年竣工，并立碑贊慶。這一年正是崇宗乾順誕生十周年，為了給他祈福，作各種佛事活動，以示慶祝：「詔命慶贊，於是用鳴法鼓，廣集有緣，兼啓法筵，普利群品。……」（見感通塔碑）

乾順與母后梁氏是當時重修護國寺的感通塔，并立碑以贊慶、碑文有兩面，一面西夏文，一面漢文，這塊碑是西夏時期保存至今的唯一的佛教石刻，現珍藏於武威縣文化館，被國務院列為重點文物保護。

感通塔碑記述了崇宗繼位後，對佛教十分重視，會集工匠，修飾佛塔，大力修葺被荒廢的寺廟，如碑文所載：「至於釋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遠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遺址，只椽片瓦，但彷彿有存者，無不必葺，況名跡顯敞，古今不

泯者乎？」永安元年（公元一〇九八年）梁太后死，崇宗乾順常供佛為母祈福，并在甘州興建臥佛寺。

崇宗乾順時期對佛教的建樹主要是翻譯佛經。自元昊時起至天祐民安元年（公元一〇九〇年）已經翻譯完三千五百七十餘卷西夏文佛經，至此西夏對漢文佛經的翻譯已基本完成，而成為我國佛教文獻中稀世珍品。

大德五年（公元一一三九年），崇宗乾順死，其子仁孝繼位，是為仁宗。這位西夏第五代仁宗皇帝在執政長達五十四年中，西夏的畜牧業又有所發展，農業更有了長足的進步，文化事業也昇華到一個新的高度，這是西夏發展史上的黃金時代。在這鼎盛時期，佛教的影響也進一步得到擴大，有了新的發展，達到了高度繁榮。這是西夏佛教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

仁孝時期佛教飛黃騰達，廣泛傳播。這一時期無論從所印佛經數量，以及佛事活動內容的豐富和作大法會的規模都堪稱鼎盛。除大量地刻印、散施佛經外，西夏佛教還校勘西夏文佛經并與藏傳佛教有所來往，是這一時期的特點。在西夏文《金光明最勝王經》流傳序中，對這一階段佛教的昌盛就作了記述：「十行泉流不盡，四法輪不絕。最後仁尊聖德皇帝已受寶座，使佛事重新，令德法復盛，三寶威顯，四本明增（「四本」，即指教、理、行、果四法）」。

西夏漢文佛經的刻印和流傳以仁宗時為最盛。有私人捨資發愿刻印；其次有貴族官僚出錢，工匠出力，共同發愿刊印；再者便是皇室出大資財，大量印施。人慶三年（公元一一四六年）由皇族宗室御史台正鬼名直本，提供費用，由雕字人王善惠等四人雕印《妙法蓮華經》，普施一切信士。其發愿文載明：「今有清信弟子雕字人王善惠、王善圓、賀善海、郭狗埋等同為法友，特

露微誠，以上殿宗室御史台正直本為結緣之首，命工鏤板，其日費飲食之類，皆宗室給之。雕印斯經一部，普施一切同欲受持」。天盛四年（公元一一五二年）由僧人劉德真私人雕板印施《注華嚴法界觀門》。其後有發愿文說明印施該經的緣起：「今者德真幸居帝里，喜遇良規，始欲修習，終難得本，至以口授則音律參差，傳寫者句文脫謬，致罷學心，必成大失。是以恭捨囊資，募工鏤板，印施流通。備諸學者，若持若誦，情盡見除；或見或聞，功齊種智」。天盛十三年（公元一一六一年）僧人王善惠私人雕印《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愿品》。天盛十九年（公元一一六七年）仁宗本人發愿雕印《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等經。此次仁宗印經目的是為追荐其母曹氏故去一周年，由於皇室財力充足，印施佛經兩萬卷。同年，執掌西夏軍政大權的太師、上公、總領軍國重事、秦晉國王任得敬，因久病不愈，為求佛福祐而發愿刻印《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乾祐十五年（公元一一八四年）仁宗發愿刻印《佛說聖大乘三歸依經》和《聖大乘勝意菩薩經》。同年由袁宗鑒等十七人印施《佛說金輪佛頂大威德熾盛光佛如來陀羅尼經》，經末明確指出是「重開板印施」，可知該經以前已雕板印施過。乾祐十六年（公元一一八五年）僧人比丘智通印施《六字大明王陀羅尼》。乾祐二十年（一一八九

年）仁宗發愿印施《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為散施此經，特作大法會，會上散施此經十萬卷，又散施漢文《金剛經》、《普賢行願經》、《觀音經》各五萬卷。一次法會散發漢文佛經二十五萬卷，由此可以推想當時漢文佛經刻印之多。同年皇后羅氏發愿印施《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和《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愿經》。在皇后羅氏印施的《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後，有「溫家寺印經院」押捺的印記。或許溫家寺是當時西夏印施漢文佛經的一

個重要寺廟。此外，仁宗時還曾刻印過《聖觀自在大悲心總持》、《勝相頂尊總持》、《聖觀自在大悲心總持功能依經錄》、《四分律行事集要顯用記》等經典。就上述流傳於世的漢文佛經，可以推想仁宗一朝由於皇帝、皇后和大臣不遺餘力的倡導，使刊刻、散施漢文佛經達到全盛時期。

當時這些發愿印施的漢文佛經，皆附有發愿文，從這些發愿文中，還可以了解到當時佛教清信士虔誠事佛，樂善好施，廣種福德的風範，以及統治者對佛教的重視和西夏佛教興盛的情況。如天盛十九年（公元一一六七年）仁宗為刻印漢文佛經《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時所作的發愿文記載：「朕親睹勝因，遂陳誠愿。尋命蘭山覺行國師沙門德慧，重將梵本再譯微言，仍集《真空觀門施食儀軌》附於卷末，連為一軸。於神妣皇太后周忌之辰，開板印造蕃、漢共二萬卷，散施臣民，仍請覺行國師等，燒結滅惡趣中圍壇儀并拽六道，及講演《金剛般若經》、《般若心經》，作法華會，大乘懺悔，放神幡，救生命，施貧濟苦等事。懇伸追薦之儀，用答勤勞之德。」從這篇發愿文中，不難想見，當時作大法會的隆重景象。又如天盛十九年，夏國權臣任得敬因患疾病，葯石無效，便發愿刻印《金剛經》為求得病愈而發愿刻經：「予論道之暇，恒持此經，每謁誠心，篤生實信。今者災迫伏累，疾病纏綿，日月雖多，葯石無效，故陳誓願，鏤板印施。仗此勝因，翼資冥祐。儻或天年未盡，速愈沉痾；必若運數難逃，早生淨土。又愿：邦家鞏固，歷服延長，歲稔時豐，民安俗阜。塵刹蘊識，悉除有漏之因，沙界含靈，並證無為之果。」如乾祐十五年（公元一一八四年）仁宗印施漢文《佛說聖大乘三歸依經》，作各種佛事活動，在發愿文中記錄得十分詳盡：「朕適奉本命之年，特發利生之愿。懇命國師、法師、禪師

暨副判、提點、承旨、僧錄、座主、衆僧等，遂乃燒施結壇，攝瓶誦咒，作廣大供養，放千種施食。讀誦大藏尊經，講演上等妙法。亦致打截，作懺悔，放生命，喂囚徒，飯僧設貧，諸多法事。仍勅有司，印造斯經，蕃漢五萬一千餘卷，彩畫功德大小五萬一千餘幀，數串不等五萬一千餘串，普施臣吏僧民，每日誦持供養。「仁宗印施此經，是因為這一年是他本人六十周歲，「本命之年」此年作大佛事，廣印佛經彩畫，以表慶賀。再如乾祐二十年（公元一一八九年）仁宗印施漢文《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有着特殊的意義，因為彌勒菩薩是末世教主，企盼彌勒早來世間，拯救群萌，令佛法不絕，而求生彌勒淨土。仁宗在這篇發愿文中着重記錄了這次法會的空前盛況：「感佛奧理，鏤板斯經。謹於乾祐己酉二十年九月十五日，恭請宗律國師、淨戒國師、大乘玄密國師、禪法師僧衆等，就大度民寺作求生兜率內宮彌勒廣大法會，燒結壇作廣大供養，奉廣大施食，并念佛誦咒，讀西蕃、蕃、漢藏經及大乘經典，說法作大乘懺悔，散施蕃、漢《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一十萬卷，漢《金剛經》、《普賢行愿經》、《觀音經》等各五萬卷，暨飯僧、放生、濟貧、釋囚諸般法事，凡十晝夜。所成功德伏愿一祖四宗，証內宮之寶位；崇孝皇妣，登兜率之蓮台。」這篇重要的御制發愿文，充分地反映出仁宗時期佛教法事活動頻繁與隆重。

仁孝時期校勘西夏文佛經，也是這一時期佛教出現的特色。因爲，西夏把漢文佛經大規模地譯成西夏文佛經，在崇宗乾順時期已經基本結束。至仁宗仁孝時期已經由漢文佛經翻譯而轉化爲大規模地校勘西夏佛經。校勘佛經，是對舊譯文中「或與聖意違，或詞義不明」的缺陷加以彌補。如《金光明最勝王經》的發愿文記載：「然舊譯經文，或與聖意違，或詞義不明，復亦需用

疏無所譯。因此建譯場，延請蕃漢法定國師譯主等，重合舊經，新譯疏義，與漢本仔細比較，刻印流行，成萬千平安。」在仁孝時期校勘佛經的數量爲最多，據保存至今的西夏文佛經來說，就有二十部全爲仁孝時期所校。因爲在這些佛經中有仁孝校經的款識，有「御校」的字樣。仁宗皇帝有很多尊號，如：「護城皇帝」、「聖德皇帝」、「珠城皇帝」、「制義去邪」等尊號，故仁孝校經的款識就不止一種稱謂。他的題款有：「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智，制義去邪，惇睦懿恭。皇帝鬼名、御校」、「奉白高大夏國仁尊聖德珠城皇帝敕重校」等。當時校勘的佛經有《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悲華經》、《經律異相》、《佛說月光菩薩經》、《佛說菩薩修行經》、《佛說了義般若波羅密多經》、《佛母大孔雀明王經》、《佛說寶雨經》、《聖勝無能者金剛火陀羅尼經》、《聖大明王隨求皆得經》、《大方廣佛華嚴經》、《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大寶積經》、《毗俱胝菩薩百八名經》、《大方等無想經》、《現在賢劫千佛名經》、《阿毗達磨順正理論》、《聖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金光明最勝王經》等。

仁宗時期對西夏文佛經的校勘，嚴肅認真，一絲不苟，使至高無上的佛法，純真無瑕，光照世間，普利天下。這是仁宗皇帝敕令校勘佛經的宗旨，如《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的發愿文中載：「後奉護城帝（即指仁宗）敕，與南北（按：以西夏國來說，宋朝在南，西夏在北）經重校，令刹寺茂，慧提照世，法雨普潤天下。」由發愿文可知，仁孝時期校經所依底本爲「南北經」。西夏稱宋朝爲「南國」，所謂「南經」當指西夏之南的宋本《開寶藏》。因爲，至仁孝時期宋朝官刻本《開寶藏》已刻印完畢。所謂「北經」是指西夏以北的遼、金所刻漢文大藏經，即

遼朝官刻的《契丹藏》和金朝刻印的《趙城藏》。西夏在皇帝的倡導和支持下系統地校勘佛經，以這南北兩種不同的版本大藏經爲底本進行核正。可見，帝王對校勘佛經的慎重。

乾祐二十四年（一一九三年）仁孝崩，其子純祐繼位，是爲桓宗。桓宗繼位之後，羅氏皇后被尊爲皇太后。她也是一位篤信佛教的信徒。她在仁孝死後不久，羅太后便發愿刊印漢文《佛說轉女身經》，冀求仁孝速證聖果，如愿文所說：「今皇太后羅氏自惟生居末世，去聖時遙，宿植良因，幸逢真教，每思仁宗之厚德，仰憑法力以荐資……」。羅太后熱心於各種佛事活動，樂善好施，廣行善舉。在蘇聯孟列夫出版《哈拉浩特特藏中漢文部分叙錄》一書中，將掠奪去的西夏經籍中漢文部分編輯成冊，在一些羅太后刻印漢文經發愿文中，可以看出羅太后的諸多善行，如度僧西蕃、蕃、漢三千員，散齋僧三萬五百九十員，施神幡一百七十一口，散施八塔成道像淨除業障功德共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六幀及蕃漢《轉女身經》、《仁王經》、《行愿經》共九萬三千部，數珠一萬六千八十八串，消演蕃漢大乘經六十一部，大乘懺悔一千一百四十九遍，皇太后宮下有私人盡皆捨放并作官人，散囚五十二次，設貧六十五次，放生羊七萬七百七十九口，大赦一次。這個發愿文不僅提供了西夏佛教施經度僧，濟貧放生，廣行善舉，而且還提供了一系列的歷史數據，具體地展示了西夏佛教後期的佛事活動盛況。

西夏桓宗天慶七年（一二〇零年）僧人智廣、慧真輯《密咒圓因往生集》，由蘭山崇法禪師沙門金剛幢譯定，書相賀宗壽作序。該集規定了持誦神咒（即陀羅尼）的禮儀，指出有三摩地念、言意念、金剛念、降魔念四種念誦方法，還集列了三十多種咒的規範讀法和念誦該咒的方法和功用。此集已列入漢文大藏經

中。它是西夏後期提倡和發展密宗的產物。隨着漢地密宗的發展，在西夏對密宗咒語很受重視，正如此集序言中所述：「是以佛証離言，廓圓境無私之照；教傳密語，呈神功必效之靈。一字包羅，統千門之妙理；多言沖邃，總五部（指密宗五大部）之旨歸。衆德所依，群生攸仰。持之則通心於當念，誦之則滅累於此生，妙矣哉！脫流幻之三有，拔險趣之七重，躋蓮社之淨方，掃雲朦之沙界，促三祇於頃刻，五智克彰，圓六變於剎那，十身頓滿。其功大，其德圓，巍巍乎不可得而思議也」。西夏僧人將衆多常用經咒集於一典，明其讀法，顯其功用，對咒語的傳習和密教的發展與推廣作出了巨大貢獻。

西夏佛教至桓宗趙純祐，先後還有襄宗趙安全、神宗趙遵項、獻宗趙德明、末主趙睨四位皇帝，歷時三十多年，由於內亂頻仍，外敵入侵，國家破敗不堪，佛教漸趨衰弱。儘管當時社會動蕩不安，但佛教仍有很多的佛事活動，只是大規模的建寺、譯經、校經等活動已不多見。從佛教整體上看，這一時期發展佛教的重點不突出，系統性不強。因此，西夏佛教後期在國勢衰敗的形勢下，而告以段落。

在我國二十多種民族的古文字中，西夏文是很重要的一種，傳世的西夏文文獻，是我國民族文獻寶庫裏很珍貴的一部分，而西夏佛教的西夏文大藏經作爲完整的刻印佛經，是少數民族文字大藏經中最古的一部。西夏漢文大藏經的刻印，使我國漢文大藏經增添了一種新的版本，而獨放異彩。西夏佛教有過輝煌的過去，研究西夏佛教就是爲了向後人展示這段不可磨滅的燦爛歷史和光輝歷程，使我國的悠久歷史淵源流長，使佛教繼往開來，法水常流。